

父亲设巧计营救同志

■朝花夕拾■

一本新华字典

1969年,我16岁。3月1日,高小毕业的我被批准参军入伍。在保定阜城县武装部,我脱去了自己的衣服,换上了军装,同时,我把一本硬皮《新华字典》悄悄地放进军用挎包。

字典的首页上写着雷锋那句名言: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可是,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,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”我立志以雷锋为榜样,当一个有文化、有军事素质的好兵。从新兵连学着写日记、试着写训练小结,到连队写发言稿、读毛选、当了卫生员看医学书,只要有不认识、不会写的字,我就向这位不会说话的“老师”请教。大学毕业后,我当了医生,还是不愿丢弃这本支持我进步的“功臣”。

白和平/文



1942年夏,驻石家庄新乐县城的日寇头目白山、情报处长小林指挥驻城的特务队、宪兵队、剔抉队,对我抗日军民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,一时间腥风血雨,弥漫全城。

一天,我党地下交通员陶运子(公开身份是城北陶家庄的伪副保长)到城里与人接头,刚办完事出来,即被特务队一个姓房的特务盯上了。陶运子马上有了警觉,一连奔走了承安铺、木运铺的几道街,都没有甩掉特务,最后被姓房的和其他几个特务押进了城里的伪警察分局。姓房的特务一口咬定,陶运子给八路军偷送过粮草、传递过情报。局长谢麻子夸了他两句,就说准备晚上将陶运子押送到长寿镇宪兵队,由日本人处置。

情况万分紧急。陶家庄地下党支部决定:必须马上设法营救。

我的父母姜文焕、王增鸾一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为掩护身份,便于开展工作,他们在老家东关村西头路南临街开了一间小杂货铺。当天下午,陶家庄的两名抗日游击小组成员陶万善、陶森修来到杂货铺,向父亲姜文焕说明了陶运子的危险情势,让他马上拿个主意搭救。父亲听完后,眉头紧锁,不大一会儿,他突然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,说道:“有办法了。我们

就通过宪兵队咱们的内线孙景云,跟他一块去找谢麻子,就说陶运子是宪兵队的耳目,这次是来为队里刺探情报的,却被姓房的当‘八路探子’抓去了。咱们就向谢麻子要人,说宪兵队头头大怒,让孙景云立时去警察局。”

天刚擦黑,父亲把孙景云约到新道街靠近苇塘的一处秘密联络点。父亲领着陶万善、陶森修与孙景云见了面,四人一同商议好行动步骤,做好了应变准备。

不多时,孙景云腰掖手枪,二陶也暗藏两把撸子枪,大摇大摆地向城里走去。到东城门时,守门人见孙景云出示了宪兵队的证件,又头戴礼帽、腰掖盒子枪,便让三人进了城。

三人快步来到伪警察分局门口,向站岗的伪警察说:“我们要见谢局长。”伪警察说:“你们是干吗的?谢局长是随便见的吗?”孙景云把眼一瞪,冲他厉声喝道:“我是宪兵队的,找谢局长有要事办,误了事你可吃罪不起!”伪警察见此情形,便说:“局长在,你们进去吧!”

来到局长办公室门前,陶万善冲着屋里大声喊道:“谢局长在吗?”一听这嗓门儿,谢麻子趑拉着鞋急忙出来迎客。他一见三人威风凛凛的派头,不敢怠慢,忙客气地打招呼:“三位好,请到屋里坐。”坐下后,谢

麻子便问:“三位前来,有何贵干?”孙景云单刀直入:“我们是宪兵队的,听说长寿剔抉队姓房的抓了个人,交给你了,可有此事?”谢麻子回答:“有这回事。”孙景云双眼直视对方,一脸严肃地说:“那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?你肯定叫姓房的给蒙了。今天我们到你这儿来,一是奉命行事,二是想拉你一把,免得惹出大麻烦来。实话跟你说,这陶运子可是宪兵队的重要耳目,你赶紧下令把他放了吧!”

谢麻子一听,为难地说:“可老房说姓陶的给八路军送过粮食,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啊!”孙景云当即顶回他去:“姓房的要是不编排得热闹些,又怎么能糊弄他们剔抉队的头头、邀功请赏呢?”陶森修也在插话:“谢局长,我们都是干这一行的,你怎么犯糊涂了?运子要不与八路军有点儿接触,又怎么摸他们的情报呢?”谢麻子一听,推脱道:“那姓房的回头找我要人怎么办?”孙景云哈哈一声冷笑,说道:“看来谢局长还信不过咱宪兵队!这么着吧,我把实话撂在这儿:姓房的要是找你要人,让他到宪兵队找我孙景云,找白山、小林队长也行,我们随时恭候!”谢麻子一见这阵势,连忙说:“景云别发火,我这就叫人放了陶运子!”

不大会儿,一个伪警察领着陶运子进来了。他一见三人与谢麻子交谈,先是愣了一下,但很快醒过神来,马上上前握住陶万善的手,说道:“真感谢你们赶来搭救我,要不我真得吃冤枉官司了!”二陶连忙说:“多亏了景云哥,一听到信儿就让我们一块来救你,要不咱们队里损失可就大啦!”紧接着,运子又冲着谢麻子说:“谢局长,这回劳你费心了。咱们这也叫不打不相识吧!以后我可少不了麻烦你,到时你可不要说不认识我呀!”三人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,谢麻子也尴尬地笑了两声。

夜已深了,四人出了警察局的大门,一溜小跑到了东关路南的小杂货铺。孙景云上前握住我父亲的手,说道:“文焕,多亏你这个诸葛亮出的锦囊妙计,把谢麻子那家伙镇住了。你看,我们把运子给你带回来了!”陶运子这才知道我父亲出妙招救了他,赶紧上前拉住我父亲的手说:“文焕哥,真得谢谢您的救命之恩,要是让汉奸特务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,就喂了洋狗啦!”父亲憨厚地笑了笑说:“别客气!弟兄们快回去吧,不少同志都急着见运子哩!”

父亲开了前门,一直目送四位战友疾行而去,直奔铁道北的陶家庄。 姜芳/文

延安宝塔山上合影

■图说往事■



我在石家庄师范学校上学时,经常听老师讲,延安是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,就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。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意志得到锻炼,1966年9月,我毕业后,参加了由班长韩俊明组织的“延安之行”。我们10名同学,背起铺盖卷,完全靠自己的双脚,跨过太行山,翻越吕梁山,步行几千里,于11月28日到达延安。图为我们9名同学在宝塔山上的合影,站在最高处的是作者本人。此图由同学张毅拍摄。

许香成/文并供图

参观北京天文馆

北京天文馆于1957年9月29日建成,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。我们班同学闻讯都很高兴,都想先睹为快,便把一次中队活动安排在北京天文馆,准备在天象厅体会一下“星际旅行”。

参观票事先发给每个同学,由个人自行决定如何去。当时我心血来潮,决定独自步行前往。我没有手表,心里也没个数,等我满头大汗地赶到天文馆时,场外早已空无一人,同学们早就入场了。天文馆大门紧闭,这时我才开始着急起来,使劲地敲门,但无人理睬,于是我转向旁边的门,把四扇门都敲了个遍,终于把门敲开了。服务员劈头盖脸地批评我:“来晚了,还到处敲

门,跑得还挺快,刚给你开门,一溜烟儿就找不着人了。”

我终于可以坐在天象厅里观看了。只见头顶上繁星密布,讲解的老师说:“这颗亮晶晶的星星是大熊星座,那颗是小熊星座,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北斗七星……”大约也就3分钟的时间,我身上的汗还没干,眼前出现了霞光万道、旭日东升的景象,只听讲解的老师说:“好!我们这次星际旅行到此就结束了,欢迎同学们以后有机会再来。”灯亮了,开始散场。我坐在座位上傻眼了,心里懊悔极了。

这件事深刻地教育了我,也时常在提醒我:办事情要有时间观念,一定要遵守时间。 孙家汇/文

